

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思想发展初探	
.....张胜祖 宋斐夫(1)	
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方向.....李 锐(27)	
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展	
.....肖效钦(57)	
五四时期的周恩来同志	
.....胡 华 王建初(74)	
周恩来同志和五四新文化运动	
.....魏宏远(92)	
周恩来同志早期革命思想发展初探	
.....廖永武 江 海(101)	
五四时期恽代英同志的思想发展	
和革命实践	
.....王宗华 张光宇 欧阳植梁(133)	
恽代英同志革命思想的发展	
.....守 和(164)	
邓中夏同志光辉的一生	
.....姜 平 李良玉(193)	
论郭沫若辛亥革命前后至五四时期	
的思想和作品.....李保均(211)	
郭沫若前期思想发展新探...顾 炯(238)	
五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王 瑶(256)	
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问题	
.....严家炎(279)	

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优良传统·····	王保生 孟繁林(302)
“五四”前后的歌谣学运动·····	钟敬文(323)
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	郭预衡(337)
略论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介绍工作·····	叶水夫(353)
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	夏 鼐(367)
五四运动和现代科学在我国的传播·····	戴念祖(375)
五四运动与达尔文进化论·····	卢继传 张秉伦(387)
从五四运动看中国革命与西方对华传教事业·····	赵复三(403)

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思想发展初探

张胜祖
宋斐夫

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时，也和伟大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样，他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正如毛泽东同志自己所说：“我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①这个转变，完成于五四时期。五四时期，中国有一批先进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先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批先进分子当中，毛泽东同志是杰出的代表。今天，我们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研究和探讨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思想转变过程，这对于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一

青年时期，毛泽东同志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有着与一般先进分子思想发展相同的过程，也有特殊的具体的过程。列宁说：“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②我们研究毛泽东同志这种思想的转变，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中去考察，具体地分析一下毛泽东同志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前，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2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第71页

毛泽东同志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的时期，比较系统地形成了自己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根源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正处于近代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内忧外患，风雨如磐。日本帝国主义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加紧对中国进行掠夺，沙俄等帝国主义继续维持着它们在中国的各种特权。中国反动政权的头子袁世凯，为了爬上皇帝的宝座，无耻地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袁世凯被抛进历史垃圾堆以后，又开始了在各个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军阀互相混战的局面。他们你争我夺，厮杀不休。国家情况一天比一天坏，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苦，日益处于黑暗、痛苦之中。

毛泽东同志的家乡湖南，阶级矛盾十分激化。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但仍然保持着封建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还使它和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本勾结在一起而变得更为凶残。土地集中情况也因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更形加剧。有的大地主竟拥有土地数万亩以至数十万亩。广大农民日趋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而不得不起来进行斗争。阶级矛盾的激化使湖南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焦点之一。在军阀混战时期，湖南由于地处南北要冲，战事连绵不绝，“战火所及，血肉横飞；戎马一经，闾里皆墟。”人民普遍遭受兵、匪之祸。后来，军阀的混战虽然暂告中止，而全省已陷于四分五裂的局面。在各派军阀的割据统治和残酷压榨下，人民根本谈不上政治上的权利，思想上的自由。特别是知识分子感到透不过气来。大家再也无法生活下去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成了广大人民的强烈要求。

从小生长在农村、与劳动人民有着密切联系并深切同情他们的毛泽东同志，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是深恶痛绝的。现实的政治环境促使他明确地站在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上。辛亥革命那年，他从报纸上知道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举行反清起义并有七十二烈士殉难以后，对清朝君主专制政府无比气愤。这期间，他研究了同盟会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基本目标是：

“驱除鞑虏(按：指清朝王室)，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毛泽东同志非常赞同这个纲领，所以武昌起义一爆发，他十分兴奋，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革命军，以实际行动支持辛亥革命。后来，辛亥革命的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攫去，封建军阀代替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赞助袁世凯称帝的交换条件，而丧心病狂的袁世凯竟予以承认。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的毛泽东同志，读了揭露这一卖国罪行的《明耻篇》后，义愤填膺，在封面上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并且收集反袁文章，以学友会的名义，编印成册，在学校内外广为散发，有力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势力。

青年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同志，不仅具有民主主义意识，敢于反对清朝皇帝，反对“袁大总统”，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五四运动以前的中国，即使是进步的思想界，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也还是很模糊的。陈独秀在“五四”前夕，甚至还认为日本可以继承德国在我国山东的特权。而毛泽东同志又是如何认识帝国主义的呢？他在一九一六年七月给肖子升^①的信中写道：“此约（指日、俄密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见人也。……大假借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我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駸駸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者)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

① 肖子升：湖南湘乡人，第一师范第二班学生，新民学会会员，一九一九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奔走在国民党官僚政客门下，当过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次长。一九三四年在故宫博物馆任监守时，盗卖文物，携款潜逃。

二十二岁的毛泽东同志，在当时的中国，在没有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条件 下，能够对国际形势分析得如此透彻，对日本政府换人不换侵略政策洞察得如此清楚，对日本侵华预见得如此准确，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如此坚定，这是同时代的先进中国人中所罕见的。

在毛泽东同志进入第一师范后不久，一场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初期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开展了。“科学”与“民主”是这个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是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实现真民主，共和国的政权形式和“真正的民主”的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同时，还看到了这次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在于没有真正发动群众参加，而群众不能起来的原因，是由于没有清除旧思想的束缚。因而主张思想革命，打倒孔家店，依靠“多数国民”的自觉和自动，来改革封建宗法制度，实现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他们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民主制度，反对专制独裁；宣传历史的进化是客观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坚决反对那些阻碍社会前进的旧事物和旧思想。这一代新人在许多方面超出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派。作为这个运动的前驱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反复证明封建礼教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孔子思想不能适应时代生活，尊孔必然导致复辟，从而把思想上反对封建礼教与政治上主张民主制度结合起来，猛烈地抨击着封建主义的独裁统治。

在这个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毛泽东同志是一名急进的闯将。通过杨昌济老师的介绍，他成了《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以后，便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如蔡和森、陈章甫、张昆弟等同志组织哲学小组，研究《新青年》中所提出来的问题。他认为《新青年》杂志所宣传的思想多半是他应该研究的新思想。据当时的同学回忆说，他这时对韩文研读的时间大大减少了；几年来决心学好英文，打算为大读英文书籍作好准备而每天花去的一部分学习时间，也用于研究近代那些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对于《新青年》中的许

多急进的民主主义观点，他是完全赞同的，并把其中精辟的论述，整段地抄在自己的笔记或日记本上，还加上自己的意见。他极为赞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的勇敢和彻底精神，认为它代表了时代的声。他说：“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①而过去自己一度赞同过的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只不过是“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幹树立枝叶扶疏之妙”。^②认为他们那种主张已经成为时代的阻力。

在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启发之下，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社会的认识水平，以及他反对封建主义的坚决彻底精神，已经达到了当时一般的民主主义者所没有达到的高度。他不仅看到了“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③而且还认识到这种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④对于这样一个社会，他认为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改造它的整个制度，改造它的政治观念。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一八年上半年间，他在读《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所写的批语中，系统地阐述了这种观点。他说：“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⑤这里所讲的“再造”、“变化”，都是指的用革命手段推翻整个的封建制度。而首要的一条，是“改建政体”。对于这样的革命，毛泽东同志充满了信心，抱定了乐观主义的精神，认为这种革命“毁”掉的只不过是一个千疮百孔的旧社会，而“成”就的是一个理想的新社会。但是，这种成就也不是一、二次革命行动所能够

① 张昆弟日记

②④ 毛泽东同志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

③⑤ 《伦理学原理》批语

完成的。因此，必须“时时涤旧，染而新之”，要有一个不断革命的精神。

在当时，毛泽东同志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明确地提出一条改造中国的根本道路。但是，他不同意当时一般的民主主义者甚至包括陈独秀这样的急进派主张从枝节问题入手的改良办法。在一九一七年给友人的信中，他阐述了这个思想：“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形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便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①毛泽东同志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是对改良主义的一种批判，同时也严格地把革命派和改良派区别清楚。尽管他所讲的“大本大源”是带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去探索的，然而他认识到了革命理论的重要作用。缺乏追求真理的革命热情，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同志，正是以特别具有革命热情而成为一个出色的革命家。

和当时一般的革命知识分子相比较，毛泽东同志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不满足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内研究新文化、新思想，而是着眼于社会，注意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对于社会环境的调查研究。徐特立同志在回忆中说：“毛泽东同志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革命思想弥漫在学校里。他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和国内的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②毛泽东同志在一师学习期间，先后于一九一七年夏同肖子升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一九一七年冬到浏阳文家市等地进行农村社会调查。通过这些农村调查，他接触到许多新的问题，获得一些新

① 毛泽东同志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

② 班威廉夫妇著《新西行漫记》第16章

的知识，使他深深感到农民受苦极深，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土地问题，的确迫切需要解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他以第一师范校友会教育研究部的名义主办工人夜校，和同学们一起到学校附近的工厂和工人宿舍，动员工人上夜校学习，自己在夜校讲课，同工人们建立了深厚感情，许多工人都说“毛先生”是他们的好老师、好朋友。

通过与工农群众的广泛联系，毛泽东同志对于革命的力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在办夜学的时候说：“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①把大多数没有文化的工农群众，看成是社会的中坚力量，这同他在一九一五年讲的“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比较起来，确实在思想认识上有了质的飞跃。同时，这里还强调提高工农基本群众的文化科学水平，是推行民主政治、开展自治运动的重要一环，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相信和依靠群众的思想。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离开了夺取政权来说群众的科学和民主，是属于一种空想，这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当时所具有的民主主义立场的局限性。可是，如果把它同政权问题联系起来，就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列宁曾经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可是文化落后性却是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努力。

那时候旧中国的社会制度，可以说腐败到了极点。早期的新文化运动虽然猛烈地抨击了孔孟之道，从精神上打击了反动统治者及其卫道士，但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它说明光有批判的武器不行，还必须有武器的批判。正是这种社会斗争的需要，更由于毛泽东同志同广大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对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有一定的认识，因而促进他的哲学思想逐步

①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校友会《夜学日志》

地由唯心论向唯物论的方向转化。

毛泽东同志酷爱哲学，他对古今中外的许多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特别是对谭嗣同的《仁学》和西方康德派的二元论做了认真的探讨。他从这些哲学思想中，吸收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经过钻研、分析，予以发挥，获得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当时，毛泽东同志一方面保留着“精神不灭”的唯心主义观点，另一方面又把物质提到和精神同等的重要地位，并且明确指出“物质不灭”。当着他用这种观点去分析自然和社会现象时，往往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他说：“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毁之法则。凡自然法则者，有必然性，吾人亦有成就其必然之愿望，没有不必然者，而且不必然，吾人固甚不愿也。”把成毁看成是自然现象内在的必然变化，把法则看成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东西，这就否定了康德的“理性替自然界立法”的唯心主义命题。毛泽东同志不仅把自然现象看成是客观的，对于美、道德等社会现象，也力图用客观规律加以说明。他指出：“美学未成立以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以前，早已人人有道德，人人皆知得此正鹄矣，种种著述皆不过钩画其实际之情状，叙述其自然之条理，无论何种之著（作）皆是述而不作。”^①毛泽东同志在主张“精神不灭”的同时，也主张“物质不灭”，其形式虽然是二元论，但他认为“心灵本之自然”，“心灵限于观念，观念限于现象，现象限于实体。”这样就把“实体”和“自然”等同起来，对“实体”作了唯物主义的理解。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这个观点更加明确。他说：“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指明了身体是从事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人类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依赖于人的整个身体官能，“于此有须于体者焉。”这就已经接近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唯物主义观点。

在认识论的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是坚决排斥先天直觉论，而

① 《伦理学原理》批语

主张经验论的。他说：“其知也，亦系经而知之。”当然，“在‘经验’这个字眼下，无疑地可以隐藏哲学上的唯物主义路线和唯心主义路线”^①，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语言的时候认为客观是第一性的，语言、精神是第二性的，他说：“此种言语在其起源确已合乎客观界之事，实乃由种种经验而来者也。”很明显，他是在唯物地解释经验。正是由于他在经验问题上所持的唯物主义态度，所以强调从天然本质中去求真理：“有无价值，人为之事也；是否真理，天然之事也。学者固当于天然本质中求真理，其有无价值其次也。”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能够如此明确地批判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提出唯物主义的真理观，这的确是了不起的。

在毛泽东同志逐步转向唯物论的同时，也开始掌握了辩证法。他认为宇宙的万事万物，无不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对立着的事物经常在互相转化。他否定形而上学的静止的、孤立的思想，指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②这个命题虽然是在论述体育时谈到的，但是，在毛泽东同志思想上却包含了更深刻、更广泛的含义。他说：“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③当然，“一治一乱”的观点，似乎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并非上升的前进的彻底的辩证观点，但是，毛泽东同志强调社会是通过变化而向前发展，以新代旧是历史发展过程，都是符合辩证法的。他不喜欢静止的生活，认为人生的幸福需要斗争：“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所堪。”他不但认为社会历史现象是这样，个人的成长和思想发展也会是这样，所以，他主张“今日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153页

② 《体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期

③ 《伦理学原理》批语

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①

这种永恒的、普遍存在的变化的由来，毛泽东同志把它归结到事物对立面的斗争。他认为，压力和反抗，作用和反作用，既是自然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他称赞德国哲学家鲍尔生提出的“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是“至真之理，至彻之言”。^②由于已认识到矛盾着的事物在剧烈斗争时，必然会互相激化，所以，又不同意鲍尔生说的“人类努力之增，与外界抵抗之减。其效本同。”他认为进步势力总是在与强大的反动势力的斗争中，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最后获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早期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观点是在反帝、反封建的实际斗争中形成的，是为当时的实际斗争服务的。也正是因为这些思想的发展，使他越来越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所以，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逐步扩大，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毛泽东同志很快地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决不是偶然的。

二

毛泽东同志由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是从一九一八年秋第一次上北京以后开始的。

这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比起辛亥革命时，有了许多变化。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之机，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也迅速成长壮大。自发的工人运动，此伏彼起。一九一七年四月，常宁水口山铅锌矿还发生了一千多工人的暴动。同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消息和真相，突破反动派的严密封锁，在一些进步的报刊上陆续报道出来，使

① 毛泽东同志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

② 《伦理学原理》批语

一些革命知识分子逐步对它有所了解和认识。

多年来寻求革命真理并与工农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毛泽东同志，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始探讨改造社会的新道路。他于一九一八年六月在第一师范毕业以后，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自修。他们试图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新村，并踏遍了岳麓山下的镇子、村落，希望获得一块适当的地方，作为新村的试验场所，但是没有成功。他们这种理想，近乎空想社会主义。列宁说：“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①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设想，正是当时蓬勃发展的自发工人运动的象征、表现和先声。这比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是大大向前进了一步，它是毛泽东同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础。

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一九一八年八月，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到达北京，并在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助理员，直到第二年四月，才经上海回到湖南。当时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学术思想界非常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北京大学更是新旧文化、新旧思想汇聚和斗争之地，各种学术团体不下十六七种。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同志购置了大量有关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外文书籍，组织一些外文水平较高的学生进行翻译。他在《言治季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热情歌颂十月革命是“列宁的功业”、“马克思的功业”，“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并满怀信心地向中国人民宣告：“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此后，《新青年》由传播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逐步转向传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它明确地提出：民主即弱小民族对强大民族要求的解放，农民对于地主要求的解放，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2页

工人对于资本主义要求的解放；科学即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观察问题。

毛泽东同志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的有利条件，接触和研究各种新思想。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介绍各种新学说的报章杂志；以浓厚的兴趣参加北京大学的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旁听北大一些他喜爱的课程；同当时新文化运动中急进的李大钊、陈独秀，温和的蔡元培、胡适等人进行接触和交谈；特别是与李大钊同志更为广泛地交换了思想，后来毛泽东同志回忆说：“我在北大当着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①

在广泛地接触当时的新思想以后，毛泽东同志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思想越来越急进。特别是当他阅读了那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报刊以后，感到眼前展现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这就促使他完全放弃以往研究过的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政治、经济学说，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毛泽东同志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这个运动。他以新民学会为核心，以湖南学生联合会为基础，积极发动和领导湖南各阶层人民进行爱国民主斗争，并且引导湖南的很多革命知识分子，走上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道路；在此同时，他自己也进一步坚定了革命意志，丰富了斗争经验，改造了思想感情。

通过认真的学习钻研和刻苦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思想越出了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范畴，向着共产主义者方向转变。这从他一九一九年七、八月间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一，热情洋溢地赞颂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十月革命及其在全世界的影响。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开端，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对待十月革命的态度，是当时鉴别一个人

① 斯诺《西行漫记》，1938年3月第2版

是否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标准之一。毛泽东同志敏锐地觉察到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他写道：“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

毛泽东同志把五四运动看成是十月革命开始的新的世界革命的一个分支，从而把中国人民的命运与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的命运联结起来。他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写到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

在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开始注意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当时的湖南军阀张敬尧面对“五四”革命洪流，坐立不安。他竭力诬蔑十月革命，称马克思主义为“过激主义”，称布尔什维克为“过激党”，叫嚷什么“湖南不得了，过激党来了”。《湘江评论》发表了好几篇短评予以驳斥，毛泽东同志也亲自著文为“过激党”辩护。他奉劝那些跟着盲目乱喊的人们说：“过激党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一光眼，过激党布满了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走处了。”

第二，开始从本质上去认识帝国主义。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也曾经谈到。但由于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以及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思想的影响，使人们长期不能从本质上去认识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在青年学生时代，对帝国主义是深恶痛绝的。特别是前面提到的一九一六年给肖子升信中那段话，在当时确实是非常深刻的见解。但从总的来说，那时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仍属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到了办《湘江评论》时，开始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初步认识了帝

国主义的本质。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帝国主义战争，可是一般资产阶级，甚至包括新文化运动的一些进步人士，也把它说成是公理与强权之争。毛泽东同志脱出了这个圈子，他指出：这回大战的结果，是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国际强权”，打倒了德、奥帝国主义的“国际强权”，并不是什么“人道”、“公理”的胜利，巴黎和会上“满嘴平等正义”的帝国主义的代表，实际上是“一类的强盗”。他们所争论的“不外得到若干土地，收赔若干金钱”。毛泽东同志认为签订了“和约”，不等于解决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新的战争仍将发生。他嘲笑法国首相克里孟梭是个“无知的老头”，“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的很呵！”并且指出：“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证明了这一预言的正确性。

毛泽东同志以无可争辩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所标榜的“民族自决”的虚伪性。他说：“西伯利亚临时政府^①有攻击过激党的功绩，故加以正式承认；日本欲伸足西伯利亚，不得不有所示好，故首先提议承认。（而）朝鲜呼号独立，死了多少人民，乱了多少地方，和会只是不理。好个民族自决！我以为只是不要脸。”

毛泽东同志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指出帝国主义完全是掠夺劳动人民的血汗发家的，“几个人幸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因此，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而“阶级战争业已发生，必待国际劳动界完全胜利，始能停止。”他风趣横生、意味深长地向帝国主义者宣告：“诸位的‘末日审判’将要到了。诸位要想留着生命，……除非大大的将脑子洗洗，将高帽子除下，将大礼服收起，和你们国里的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

① “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它是1918年2月9日在托姆斯克建立的白卫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政府，1919年随着高尔察克的失败而被消灭。